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〇年 第一辑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 京 出 版 社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38,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0

书号: 10071·270 定价: 0.82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〇年·

目

录

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一九六二年五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

的谈话夏 衍 (1)

回忆“左联”五记马 宁 (8)

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陆万美 (17)

“左联”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吉 世 (27)

鲁 迅 研 究

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陈安湖 (41)

深深地培植在被压迫农民的沃土里

——鲁迅小说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一个探索李希凡 (98)

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吴中杰 (126)

鲁迅思想发展的鲜明轨迹

——论鲁迅小说中“我”的艺术形象丁尔纲 (156)

作家作品研究

《春蚕》小议

——关于题材来源与艺术构思问题叶子铭 (170)

黑牡丹与诗的灵感

——谈郭沫若早期新诗中的科学色彩兰棣之 (181)

第一辑 (总第二辑)

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

——略论郁达夫……………朱靖华 (194)

冰心简论……………赵凤翔 (223)

试评胡适的小说考证……………陆树仑 李庆甲 (239)

作 家 自 述

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姚雪垠 (267)

札 记 随 笔

关于鲁迅若干作品的考订……………林志浩 (283)

秉笔直书与随心所欲……………袁万里 (289)

回 忆 录

横叫风雨打山林

——回忆郭沫若同志的片断……………徐 敏 董正岩 (295)

五四风雷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李霁野 (298)

资 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

传播……………蔡清富 (306)

有关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刘增杰 (312)

关于日文《北京周报》……………陈漱渝 (316)

与《两地书》有关的一份史料……………钱超尘 (322)

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一九六二年五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
编写组的谈话

夏 衍

看了几本现代文学史，有些感触，觉得写“左联”的部分，都比较简单，也不很准确。关于“左联”，日本人倒在认真研究，每次作家代表团来，都要求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今天，我想谈谈“左联”在革命文化建设上的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从头至尾参加“左联”活动的现在还有十儿人，如果都到了八宝山，将来靠人来考证就麻烦了。事过三十年，对“左联”的功过，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研究、评论了。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但中国的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文化界、文艺界，没有被吓倒。“普罗文学”的旗帜鲜明地举了起来，斗争得很顽强。正象鲁迅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页历史是用血写成的，死了不少人。“左联”在国统区建立起一条强大的革命文艺战线，出了不少书刊，团结了不少青年，虽然它只有六年，但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同志说文艺应该

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对“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是可以这样说的。国民党统治全国后，政权、军权、财权都在他们手里，但文化上的领导权不在他们手里，可以说没有一天在他们手里过。倒是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领导了国统区文化运动。宋美龄曾向冰心表示，惋惜国民党方面没有象她那样的女作家，冰心说：不仅女作家，就是男作家，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几个。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后来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作家有几个？！这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少作家跑到国外去的情形很不相同，这里就有“左联”的一份功绩。

当然，“左联”也有不少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副作用也有。政治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创作思想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一些左翼作家写的文章盛气凌人，非常“左”，所以鲁迅看不顺眼。现在我们自己去看，也会看不顺眼的。

那么这些缺点错误是不是一贯的？是否所有的团体、所有的成员都犯有这些错误呢？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一些现代文学史的毛病，正是表现在这里。

如果错误是一贯的，为什么“左联”到解散时成员增多而不是减少？为什么外围组织发展了而不是缩小了？

我排了一个时间表。计算起来，全党三次“左”倾路线中有两次都是在“左联”成立的六年之内。可以说，“左联”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路线正确了，但由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起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我们与中央失去联系，因而根本不知道中央的精神。所以，要求“左联”不“左”，不犯错误，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会犯错误？我们这些人首先对革命性质不很清楚。中

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点现在说起来很清楚，但当时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就不很清楚。我们认为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口号提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组织的也是“普罗诗社”等等。我们没有提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就会吓跑一些人。

“左联”的主要成员可以分析一下：无非是原来的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鲁迅系统的语丝社以及南国社等等。就成员的性质来说，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还是没落地主、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他们集中在上海是因为大革命失败。有一批人是南昌起义后从广东退回来的，象郭沫若、阳翰笙、李一氓。有一批人是因为国民党搞“清党”，在各地站不住脚跑到上海来的，象原来在武汉的钱杏邨，原来在海陆丰的洪灵菲、戴平万、冯铿，原来在浙江的柔石等。还有一批是从日本赶回来的，象我、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等。这些人里，有不少人因愤慨于国民党屠杀政策而产生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要他们不“左”不可能——不“左”就右了，当时有些人就消极。我们当时确实有一种拚命主义的情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实在厉害，杨虎、陈群就在江、浙这一带大肆屠杀，当时称之为“狼虎成群”。另外，从思想影响上说，我们接受了许多“左”的东西，如蒋光慈接受苏联“拉普”的影响，创造社从日本回来的人受日共福本和夫路线的“左”倾影响，教条得厉害。我们都还年青，原先还受过五四新思潮的熏陶，那也是一种要把线装书丢进茅坑、全盘西化的带有“左”倾成份的思潮。因此，我们容易空喊口号，喜欢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些口号，搬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些革命口号。我们不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情世故，而鲁迅就比我

们强得多，他觉得我们“左”得可爱。当时我们连一根枪都没有，但逢到节假日却常常上街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高喊“武装保卫苏联”。每次这样的活动总要被捕去一些人，但不参加游行还要受批评。怪不得鲁迅要批评我们“有勇无谋”，“赤膊上阵”，“缺少韧性”，指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既不会讲道理，可不就扣帽子、打棍子，搞那些“辱骂恐吓”的战术！我们中间，很少人原先就搞文艺，也根本不会写小说，只知道把文艺作武器。这样做当然会在文艺上带来简单化。

但是，从“左联”开始筹备到最后解散，这些缺点错误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是处在变化和克服、再产生、再克服的过程中。

一九二九年秋筹备“左联”，这是因为党制止了太阳社、创造社和鲁迅之间的激烈争论。当时周恩来、李富春同志有指示。但在筹备过程中也还继续有争论，如我们中有些人不同意郁达夫作为“左联”发起人，但由于鲁迅的坚持而同意了；也曾有人反对田汉加入，因为田汉一九二八年还有唯美主义倾向。由于党的领导，这些缺点还是纠正了。“左联”成立时七个常委的安排，就体现了党的团结合作的指示精神，照顾了各个团体，各个方面，鲁迅、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南国社都有人，加上我这个没有参加这些文艺团体而又与各方面都有点关系的“无党无派”——我最早给《语丝》写过稿，后来跟创造社有点关系，又同蒋光慈住在一起，跟鲁迅又是大同乡。

“左联”从成立到一九三二年初这一段时期也还是“左”。但“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九一八”前，我们连租旅馆都困难。“九一八”、“一二八”以后，上海市民对“抗日分子”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这是客观形势发展所致。另外，实际工作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懂得要活动下去，非得改变办法不行。柔石等二十

多人被捕，每次飞行集会中人员的损失（孟超有一次也差点被捕，只是躲到施粥厂的锅里才幸免），这些都逼得我们改变某些作法。正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到的那样，“左”倾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使白区工作的许多同志有所觉悟。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上述缺点错误的克服，跟瞿秋白同志有很大关系。秋白被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央之后，从一九三一年起在上海领导文艺工作，这给“左联”的活动带来很大变化，不但使“左联”得以保持下来，而且能够有所发展。秋白支持鲁迅，把“左联”成员跟鲁迅的关系搞好。秋白好几次跟我谈到鲁迅的重要性。再有，左翼的人打进电影业中去，秋白也有很大功劳。我们在电影界本来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因明星公司老板之一跟钱杏邨是同乡，他找钱杏邨写电影剧本。我们当时觉得电影界流氓很多，怕搞不起来，有点畏缩不前。但秋白却支持我们去试一试，后来果然取得了很大进展。还有一件事：一九三一年以后，洪深、应云卫、朱穰丞都跟我们一起搞“剧联”活动，这些人原来或与国民党的文人有交往，或是三北轮船公司买办，如果不是秋白领导文艺工作，我们不会将这些人团结进来。后来，联华电影公司，百代唱片公司，我们都打进去了，搞救亡歌曲，还争取了一些人。所以，在秋白领导下，统一战线和活动地盘都扩大了。秋白领导的二年多时间（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底），是左翼文化运动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王明等并不重视左翼文化运动，他们把自己认为不重要的这个文化工作交给秋白，而秋白就领导了起来，做出了成绩。这几年里，我们改变了与郑振铎的关系，争取了许多朋友；《申报》、《时事新报》、《大晚报》等许多文艺副刊都抓在我们手里；歌咏运动开展起来了，救亡唱片在群众中很流行。当时，邹韬奋、章乃器等都与我們有了联系。国民党的电影、戏剧受到我们围攻。可以说，“左联”

开始时的宗派主义，到一九三四年前后，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较大的克服。

那么，为什么“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都要到一九三六年初呢？这是因为，秋白走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遭到破坏，大批党员被捕（阳翰笙、杜国庠、许涤新、朱镜我、田汉等被捕都在这时），党的文委成员只剩下我和周扬，阿英虽然幸免，但他父亲也被捕了。江苏省委虽然重新成立了一下，旋即又遭破坏。大约有一年半时间，我们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但我们几个人还是搞下去（当时上海文化界党员还有一百四五十人）。不久，我们与同样失掉了组织关系的胡乔木、章汉夫、杨仿之取得了联系，加上当时社联的负责人钱亦石，我们五人组织了一个临时文总的领导组织（杨仿之为干事）。在这之前，一九三三年胡风从日本回到了上海，经冯雪峰介绍认识了鲁迅，他与鲁迅经常在一起，而我们却因为公开活动困难，与鲁迅接近得少。胡风在鲁迅面前总是把我们描写成一九二八年论争时的样子，而实际上我们那时对自己毛病是有所认识有所克服的。

我们于一九三六年初从史沫特莱处得到共产国际通讯，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知道了党的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研究后，就想取消“左联”，但无处请示，就通过史沫特莱向“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同盟代表肖三写信，间接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请示，经同意后，就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此后就有两个口号论争，混战一场。“左联”以内战始，以内战终。对两个口号的这场论争，我认为冯雪峰也负有责任。他在筹备成立“左联”的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回到上海，根本不找我们（找鲁迅完全对）。直到两个口号争了很久，才和我们见面。而且他事先在外面公开说只有

他才是共产党，别人都不是党员，不承认我们是党员，所以我们很生气。我们要解散“左联”，事先通过茅盾同鲁迅谈了。鲁迅不反对解散“左联”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但却不相信我们真会改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毛病，他幽默地说：“孙猴子会丢掉金箍棒？”

当然，“左联”的缺点错误当时不可能完全克服，完全解决。真正从思想上逐渐得到解决，要到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之后。在当时国统区，我们根本听不到毛泽东同志的声音，客观上也没有条件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时我们也下厂，到工人中去搞文艺小组等，取得一些成果，但实际上不可能想深入工农兵，而且还常常碰钉子。

苏联清算“拉普”的时候，我们仍在“左”的劲头上，并未给予重视。而且，懂俄文、直接读苏联书刊的人不多，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大。

回忆“左联”五记

马 宁

(一)在金门饭店召开的全体大会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左联”全体大会，是在上海市中心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北面的南京西路金门饭店（现在的华侨饭店旧址）召开的。那时，这座饭店的楼面是封闭式的建筑，上楼要乘电梯。电梯门首倚立着一个小黑板，上书“三楼南国社请客”。

那天的电梯司机可能是我们的同情者，很负责，没有信号，他不开动，看过证物才让我们上楼。我记得他穿的是白色的制服，中等身材，略胖，

庄重而严肃，年纪约四十岁。我们租用的是靠马路边即前面的大厅，有好几张茶桌，足可容纳几十人。桌上有简便的茶点。桌子一个挨着一个，坐下了就只好随便走动。我是跟冯铿、曾锐前后入席的。当时人已经到了不少，我们选择了靠马路边的窗口座位，可以俯瞰跑马厅，也能窥探下面的动静。

会上，先是柔石简单地介绍了这年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①。冯铿

^①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正式召开的。上海的这次会是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总工会发起的，各地苏区派代表出席。福建苏区的代表是我的同乡郭滴人（代表党）、陈品山（代表共青团）。冯铿带他们来找我，并要他们谈苏区的生活与斗争。冯铿后来发表的一些日记体作品，多是那天他们讲的故事。

代表“左联”参加了这个大会的
准备会工作。大会召开时，柔
石和胡也频代表“左联”出席，
他们并在会上宣读了“左联”的
祝词。柔石还详细地介绍了这
次大会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
纲草案》。我记得当他讲到中国
几亿农民每人将得到自己的土
地时，会场一时活跃起来，但
因为严守纪律，谁也没有鼓掌。
虽然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和有
轨电车来往奔驰的咔咔声很是
刺耳，柔石同志的声音也不能
太大，还要严防隔墙有耳。

许多材料都没有提到柔石

（二） 蒋光慈和钱杏邨合编《拓荒者》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旬，钱
杏邨和蒋光慈到上海派克路宝
隆医院内科三等病房看我。这
是我首次跟蒋光慈见面，也是
最后一次。

我没有和蒋光慈见面以
前，曾听人家说，他这人很孤
傲，不好接近。那天初次见面
时，他跟我拉拉手后便不多说

同志宣读《中国土地法大纲草
案》这件事，因为我是来自农
村的贫农子弟，对此特别敏感，
所以记忆犹新。

当天到会的有五、六十人。
那时鲁迅先生不在上海，所以
没有到会。参加那次大会的人
现在活着的不很多了。一九三
六年鲁迅先生出殡那天，我在
万国殡仪馆碰见过曾锐爪，他
就在附近的滨海中学教书；那
时他和钱杏邨（阿英）同志有来
往。三十年代他有诗歌发表，
以后情况不明。

话，果然跟传说差不多。我跟
他说，我是《少年漂泊者》的爱
好者，他只冷漠地笑一笑，也
不多话。

杏邨说：《拓荒者》是光慈
同志编的。不待他说完，光慈
抢着说，“不，应该说是我们两
人合编的。”这么看，光慈又并
不是孤傲的，还算是谦逊的人。

末后，光慈才说，现在就是小说稿子少，希望我为《拓荒者》写一篇。我答应了。好象他嫌病室里的空气不好，推说有事，先走了。

我在病床上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西伯利亚》，被发表在《拓荒者》五、六月合刊上。这篇作品是抱病写的，写得非常粗糙；那个俄国红军的名字怪别扭，光慈是留苏的，也不为我改一改。但他总算看得起我，把它一字不改地发表了。

当时，杏邨说：我们同住一楼，光慈有胃病，但仍坚持工作。他们两人合编一个大型杂志确是很不容易。杂志的主要联络员只有冯铿一人。我们的稿子都经冯铿转送。冯铿是以南强书局编辑部做掩护的。

他们两人合编的大型杂志《拓荒者》，当时是作为“左联”的机关杂志发行的，销路很大，影响深远，起了宣传革命的重大作用。国民党害怕它，不久便扼杀了它。

当时，《拓荒者》从出版商现代书局领到的编辑费很少。据杏邨同志说：后来现代书局老板卢其推托说，刊物被国民党禁止了，书店亏了本，干脆不给编辑费了。事实上，书店发了财，不发财他才不给你印哩。后来，“左联”机关杂志《北斗》等等杂志能够继续出版，原因也在这里。那时我们谁也不是先领了薪金和编辑费，才去编刊物的。

现在，我们好些文艺杂志，一个编辑部有好几十人，但是编出的刊物都是小小的一本，不到《拓荒者》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怀念“左联”先烈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想到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杂志编辑部，使用了那么多的编辑人员，国家在这上头花了大量大量的钱，实在愧对先烈。我想，假如我们印出的杂志，读者不多，销路不大，而又花那么多的人力和资金，不是双浪费吗？为了四个现代化，是不是可以限期走企

业化的道路呢？到期不能够企业化的，说明读者仍是不欢迎它，为什么不可以停刊呢？大

家转业去干别的工作，不是照样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吗？

（三）“左联”接头处的日常活动

“左联”在上海闹市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的小街里，租了一座两层小楼做秘密接头处。楼上有两间大房，可作为开会、聚谈的场所。“左联”有七个常委，两个候补委员。可能是因为分工关系，常到接头处的常委是钱杏邨、冯乃超、郑伯奇三人，洪灵菲有时也来。我只是不曾在接头处碰到过鲁迅和沈端先（夏衍），也不曾见到田汉。候补委员两人中只有周全平常来，而蒋光慈则从未露过面。盟员中冯铿和我是常到的，我们最常碰到的是钱杏邨、周全平、郑伯奇。殷夫和柔石，我只在接头处遇到一次。钱杏邨有会必到，每次都碰到他。他象长辈那样关心我的成长，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另有个女同志来过接头处一次。解

放后我曾问钱杏邨同志此人是谁，他也记不很清楚，但说可能是苏菲亚（S.F.A.），怕就是安娥吧。仿佛他还说过：她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大家常在接头处交谈创作经验和传阅彼此未发表的新作；有时也发生极友好的争论。

有一回，冯铿和周全平两人对我的两部中篇新作《土地快车》和《上海是公共大食堂》（《被忘却的市集》）有过一场争论。周全平说：“《土地快车》很好，我以为有几段虽然太少深刻的描写，但这是马宁所有作品的风格；不过《被忘却的市集》这部小说我却看不大惯，大概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作品吧！”冯铿接下去说道：“《被忘却的市集》整个地是失业工人区的生活，我以为顶好；《土地快

车》好固然好，但我总以为有几段应该多描写些，并且也当少写些家庭方面的。”（照抄1932年春作、刊于1937年5月《艺文线》第一期的《冯铿还活着的时候》）

有一回，郑伯奇、灵菲、冯铿等人在接头处传阅我试写的几篇工农小说。这是我听从李伟森同志的指导，深入基层写出《人力车夫阿毛的上吊和他上吊以后发生的故事》（参看《革命斗争与创作实践——记李伟森》）以后，又受到柔石同志的书面鼓舞，陆续写出来的《老太婆》、《穷医生》、《前线没有战争》、《新女性》和《最上层的哲学》等篇。郑伯奇十分仔细地看稿，又关心每个人的意见，最后给我以莫大的鼓舞，取《最上层的哲学》为书名，转送姚蓬子去出版。由于白色恐怖的加剧，姚蓬子推说出版有困难，但又不退还原稿，后来 he 被捕变节，原稿也下落不明。解放后我多次专函询问此事，

他竟一个字的回信也不写，可能是仗恃有“神童”的儿子姚文元吧？

现在回忆往事，我觉得“左联”接头处这样传阅同志们的新作，各抒己见地、极为友好地、坦白地、热情地自由讨论非常好。那时，只须作品是面向敌人的，大家就不会吹毛求疵，更不会有乱舞棍子的“英雄”；很少有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作者，也没有人以祖师爷自居，随意砍杀一部作品。解放后，我曾听好多同行说：最怕参加作品讨论会。作者写出一部新作品常常要屈从领导、主编的意见，要按照他们的意见去修改，不然，你就不要想发表、出版。特别是电影剧本创作，据说，导演有权任意处理并非你自己同意的情节；他可以拍出一个远离你的原作的主题和思想的片子。象夏衍同志改编的《祝福》和《林家铺子》那样，忠于原著高于原著的作品太少了。有人愤怒地说：“我发

誓不再写电影剧本了!”“我们的作品讨论会好象是公审会。”

因此，我回忆起“左联”时代接头处那种彼此传阅作品，互相友好地交换意见的方式，

对于繁荣创作，鼓励创作是个很值得推广的经验；我热切地希望各省、各地区有这样的和睦的作家之家！

（四）田汉停演《卡门》与左翼剧团联盟的诞生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没有成立。田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被推选为常委，但他一直忙着南国社的活动，没时间参与“左联”的工作。我记得是一九三〇年夏，田汉为主的南国社在上海中央戏院公演《卡门》，这是南国社首次在大戏院公演，曾轰动一时。但“左联”的不少同志对这次南国社的演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田汉本人既已参加了“左联”，没有演出较有政治内容的话剧，不能作为戏剧界的模范，一定要他按着“左联”的战斗纲领搞话剧运动。为此，“左联”接头处就针对着这件事开了个小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记

得有钱杏邨、周全平、冯铿、冯乃超等人。会上，有人建议由我去找田汉，建议他与艺术剧社合作，结合政治形势演出，不要沿着为艺术而艺术、为演戏而演戏这条道滑下去。因为我曾是南国社大本营南国艺术学院的学员，是田汉的学生，彼此较了解，好谈话。

我答应试一试，但心里却一直闹矛盾，认为“左联”同志们对田汉当时的处境不了解；其实就是连田汉搞那样的话剧运动，国民党反动派也要干预，舞台上出现影射暴君的台词不能有，只演小人物的悲剧也打动不了那些贪官污吏的狗肺狼心。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紧跟着田汉的那一批话剧爱好者